

“砖家”，不仅仅是专家惹的祸

□ 谢小军

网上曾有这样一个段子，“一头猪想过一座断桥，可断桥间的缝隙远长于猪的身长，但猪最后却过去了，问猪是怎么做到的？”后面网友的回答五花八门，有说数据是统计局统计的，有说把猪交给城管，第二天它必靠着脸贴在出现在桥的另一侧，还有的说猪最后过去了是专家经过研究后说的……搞笑的答案中蕴含着对时弊的嘲讽，荒诞中透出网民对社会现象的不满和批判。

如今专家确实是一个常被板砖的群体，一些专家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上常常发出一些挑战公众理智和情感的言论，这些言论被媒体放大后，在社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在当前社会尤其是网络语境中，专家、教授很多时候富含贬义，它们常被“砖家”、“叫兽”这样的谐音词替代，这样的称呼同几十年前“臭老九”的名号一样令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不过那时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打倒了知识分子的尊严，这则则是自下而上公众主动拉掉了专家的颜面。社会舆论是对专家的声讨，“有知识，没

良心”、“弱智加脑残”，都是给专家冠以的标签。的确，在这个功利和浮躁的年代，一些学者学问做得不够严谨，却乐于就公共问题甚至不属于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高谈阔论；一些学者守不住学术的底线，求名求利心切，成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于是有意无意地发出一些与公众切身利益相悖的言论。专家放炮言论过多，损害着学者的公众形象，腐蚀着知识与公众的相互信任，更误导着决策者的思维，其危害不容小觑。

一些舆论指出，要破除“砖家”现象，学者要管好自己的嘴。面对扩张的知识和个人有限的智力之间的日益冲突，学者应有自知之明。哲人歌德说：“在我不能明辨是非的领域，也就不存在我的权力。”一个真正的学者懂得如何珍惜自己的话语权，不会随意将偏见和认识带到公共领域，当今的某些学者应学会言行上的自律，尤其是面对利益时的自律。自律需要人格的自重，而这唯有当权力和资本对知识的尊重充满敬畏才可能普遍实现，这是一个足

够漫长而又艰巨的社会工程。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将“砖家”现象简单地归咎于学者的品德或能力，那便失之偏颇。至少也曾发生过某些满腹学识、也不乏道德和良知的学者被公众误拍的事例。部分原因是这些学者没有学会在不同的语境下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学者在学术圈中面对的都是同行，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语言形式，其交流顺畅无阻。相反，当学者与公众打交道时，常常忽视他们与公众在知识的把握上是不对等的，学术语言与大众语言也是有隔阂的。所以，如何按惯性的思维进行交流，稍有不慎便会造成公众的误解，很容易被公众抓住“把柄”。因此，在媒体上当专家真得要掌握好与公众交流的技巧和艺术。

除了学者自身外，还有媒体的因素也推动了“砖家”的产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信息传播的中介——大众传媒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人们离不开媒体。但与此同时，媒体也离不开公众的注意，一些媒体，如电视出于收视率考虑，过分地重视专家的镜前表现力，

要求能说会道、善于展开话题，对专家的学识却欠缺把关。有时为了凸显权威，常常轻易就给采访对象冠之以“专家”的头衔。君不见，倒掉的林光常、张悟本之流不是曾经被某些媒体以专家身份奉为上宾吗？另外，某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往往断章取义或者模糊了语境，或者弄个耸人的标题，这恐怕也是“造就”部分“砖家”的原因所在。

“砖家”众多与我们公众或许没有那么一丁点关系。对于学者的言论，公众应保持足够的冷静，不要听见几句不入耳的话，就立刻开骂，这实在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其实，学术有它自己的规律，往往超越人的经验和常识，如果总是以自己的生活或学识框框来判定学术，那显然就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有时某些学者的学术观点固然不那么动听，但我们不妨耐心地听听他的道理，或许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砖家”。在今天这个火气弥漫的社会，公众需要一点宽容和包容，这种品质对于学者、学术和我们自身都显得弥足珍贵。



图/CFP

对柴静美国产女的讨论可以深刻些

□ 杨雪

一直深受公众喜爱的央视著名调查记者柴静从美国产女归来，却没有得到作为一个新晋妈妈应得的祝福，取而代之的是网络上的一片口诛笔伐。

也许是春节过后还没有恢复平常的新闻节奏，事件甚少，又恰逢逢名人名人知异国产子这样的敏感话题，于是踢爆了公众神经，情绪倾泻而出，对于一个小女子凭借自己能力把孩子生在美国这样一件不算大的事，进行了声色俱厉的道德批判。相形之下，网络舆论对东莞事件的讨论，却呈现出超越道德标准的宽容。

作为一个记录真实、独立思考的央视记者，你所能看到的她站在一线寻找真相，为民众代言，你所看不到也许是一期期尖锐而深刻的节目“胎死腹中”，甚至她本人被调离岗位。而她也只不过是一名良知尚存的记者，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她可以将对社会底层的同情关注以及她的理想与担当暴露于公众面前。说到底，她只是一名守望者，或因守望而

失望，或因点燃希望而濒临绝望。她自己只能在撼不动的坚硬面前选择适应，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不言之力，不言放弃，但作为一个母亲，出于一种人类最无私最本真的爱，在能力范围内为孩子选择出生地，这是她的自由和权利，无可厚非。

如果硬要说在体制内领取俸禄并享受名誉的人，去海外生子就是抛弃民族，就是背叛祖国，那么，那些整天活跃在网络空间里大放厥词抨击体制的“公知”们，也有不少是在体制内享受着福利保障，甚至名利双收吧？从这个逻辑上讲，这些人何尝不是坐收了既得利益还不买账的小人，公众又何以对其奉若神明、趋之若鹜？

所以，对柴静美国产女这件事的讨伐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实在不值得争论。不过，这种讨伐现象倒是抛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割裂一下公众舆论在不同的事件上何以表现出多重道德标准，又比如深究一下当下社会精英热衷于海外产子以及移民的原因。

医事之痛：重提“理解万岁”

□ 尹传红

温馨、祥和的春节刚过，就接连发生了两起血腥的医院暴力事件。先是2月1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北满特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孙东涛，在出诊过程中被一男子用利器猛击头部，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仅仅过了一天，2月18日下午，河北省保定市易县人民医院普外科医生李爱新，在办公室被人用匕首刺破喉部，后经抢救方脱离生命危险。

前一起凶案披露出来的另一个事实，又让人心头一惊：行凶者竟是一名未满19岁的高三学生！而黑龙江省卫生计生委随后下发的一个紧急通知，在让人稍感宽慰的同时，却也不免发出“剑拔弩张”之叹——按照该通知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建设的要求，每20张病床配备1名保安，或者，保安员数量应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日均门诊量的3%的标准配备。

由“20:1”联想开去，在有着数百上千张病床的大医院里，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景观”？医者、患者、旁观者又如何看待？何况，

这类暴力事件几乎都带着突发、玩命的性质，可谓防不胜防。笔者以为，只要隐患在，就是派武警公安“驻守”，恐怕能起到的也只是有限的威慑作用。

因医患双方关系紧张而引发的医事之痛，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度且久议不衰的热门话题，说其为“社会病”亦不为过。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调查统计，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我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22.9%。2003年—2012年，全国共发生恶性暴力伤医事件40起，且都造成医务人员功能障碍、残疾、死亡等严重后果。2013年，被媒体报道的伤医案件有近30起。另据中国医师协会对2013年10月份的暴力伤医事件统计：2013年10月17日至27日，短短10天，全国就发生6起患者伤医事件，多位医护人员重伤甚至死亡。

尽管对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局面的原因可以从多个层面探究，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互不信任甚至走向敌对的医患关系蔓延下

去，最终受害的是病人和医生自己，是医学的进步与医疗事业的发展，甚至是整个社会。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太多的医患对立，87.2%的医务工作者在接受调查时表示暴力伤医事件对自己影响非常大，28.4%的医务工作者明确表示会选择自我保护型诊疗，39.8%的医务工作者表示过放弃从医的念头，超过60%的医务工作者对当前执业环境感到失望。而最新的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显示，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在中国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

“理解万岁”，这句二三十年前曾经给无数人带来过温暖和激励的话语，如今似乎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然淡漠。当“白衣天使”的美誉伴随着医生的职业光环日渐消逝的时候，人们好像并没有特别比照过，我们所面对的就医环境和医疗体制已经大大有别于往昔；在医学难题一个个被攻克、医疗奇迹不断展现出来的当下，在中国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可是，我们却很少设身处地

去想一想与我们密切相连的另一方，那个同样也有着很多无奈、委屈乃至怨愤的“白色群体”。更别提，在医疗资源紧缺、工作强度加大、收入分配机制不顺、执业环境不和谐等等背景下他们所负担的沉重压力。

纵观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伤医事件，医生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医疗体制顽疾的替罪羊。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继续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比如，有医学界人士提出，通过分级诊疗制度，能够将患者根据病情轻重合理分流，这有助于医生能有更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与患者沟通，最大限度缓和医患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提高公众对健康教育知识的知晓率，正确认识、对待疾病，让更多的人理解医学中存在的诸多未知性和风险，尊重生命、理解医生、建立互信，也能够为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挥积极的作用。

有句俗话说得好：“医疗界的每一丝冷漠，都会加倍放大到社会中；医疗界的每一丝温暖，也会加倍普照到人间去。”说到底，医患双方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双方的共同敌人是疾病，是伤痛，是死神。所以从本质上讲，医患双方应当是亲密无间的关系。“矫正”和“医治”扭曲的医患关系已成当务之急。理性和人文关怀，是医学最重要的支撑。

要想聊得来，请先知道不聊什么

□ 卢阳旭

春节期间，80、90后年轻人的成绩、收入、恋爱、结婚、生孩子情况是亲戚聚会聊天绕不开的话题。但从微信、微博和QQ等网络平台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广场舞大妈们的拷问式关切，越来越多的80、90后年轻人对之表示不悦、不满。

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问者不认为这些信息不能问、不能聊，而被问者却认为它们是自己的隐私，对方不应该过多打听，甚至根本就不该问。双方在何时、何地以及何种事项上应该做到“你不言我不语”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聊起天来，自然常是不尴不尬，极端者甚至不欢而散。

隐私，简单地说，就是指个人的哪些事对于哪些人是不应该公开的。稍有生活常识的

人都知道，私人信息的分享圈子背后是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圈子。比如人们认为，有些事请家人是可以知道的，但其他人是不应该知道的；有些事请好朋友是可以知道的，但陌生人是不能知道的。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关系圈子构成了相互嵌套的同心圆，以自我为中心，越处于外圈的圈子，关系越疏远，信息含量越稀薄，能在这些圈子里传播的隐私的私密程度越低。在研究中，研究者称之为隐私的“差序格局”。

事实上，每个社会都会有一套关于隐私的“差序格局”的文化规范和行为准则，它告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哪些人可以知道自己的哪些事，什么人的什么事是自己不应该打听的、不能随便说的。因此，通常来说，由于双方对隐私理解的差异造成的聊天、沟通问题只会出现

在来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但是，当一个社会的变迁速度足够快时，即使是在同一个社会中，不同区域、代际之间对隐私的定义和理解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对于很多七大姑、八大姨来说，她们仍然生活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在这里人们不认为问自己的侄子、外甥，甚至问村东家儿子李家的成绩、收入、婚姻有什么不妥。但对于很多因上学、工作而离开家乡，常年生活在城市这个陌生人社会当中的80、90后来说，他们更多地接受甚至完全认可了新的人际距离观念，形成了天然的隐私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拷问者的“亲戚”和作为被拷问者的年轻人，他们对个人隐私的定义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快速的社会变迁还会造成隐

私的“差序格局”所倚赖的社会关系圈子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私人信息的分享圈子可能会偏离甚至脱离诸如七大姑、八大姨这些完全由血缘关系决定的亲戚关系圈子，更多地与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志趣而建立的朋友关系圈子重合。虽然，这两个圈子并不相互排斥，且常有交叠之处，但当那些可能实际处于80、90后年轻人信息公开圈外层的亲戚们试图跳进圈内时，很多人就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有被冒犯的感觉。

人们见面聊什么，不聊什么，与谁聊什么，与谁不聊什么，是我们与人聊天、沟通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的快速社会变迁给人们的观念，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聊天的话题、沟通的方式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当人们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乐于在行为上做出适当的改变时，我们就能相信，纵使在人们抱持不同的观念而使彼此互动时有不适应、不协调，他们也能逐渐学会聊天，懂得沟通，并更好地相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变迁既轰轰烈烈，又细致入微。

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系统、不同数据格式之间的海量数据融合和交互，形成新的支持决策的数据源。数据资源建设是智慧城市建设重点，没有数据就没有智慧产生的根源，就没有构架在数据整合开发基础上的智慧决策。

第三，智慧城市建设必须了解城市需求。智慧城市建设的目的不是百姓满意，要从城市的实际出发，不能急于求成，要充分了解城市居民的实际需求，依据本城市的基础，找到本城市群众发展的突破口。以人为本，除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不要依靠已有的建设经验之外，还要注意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经验。

第四，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流将成为城市运转的“血液”。可以说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硬件是支撑，海量数据是基础，数据的融合、开发是核心，激发城市信息化活力是智慧城市建设方向。

第五，信息安全将是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难题。海量信息的搜集存储，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提，同时也让信息处于安全风险之中。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初期对信息安全的关注应该是重中之重，也是难点。

建设智慧城市，是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全球信息技术革新步伐加快，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发展支撑。在智慧城市发展道路上还有更多难题需要逐步破解，而破解这些难题，需要集各方专家的大智慧和城市建设者们的不懈努力。

(作者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技情报研究所副所长)

互联网金融冲击波的背后

□ 王晓松

马年春节虽然少了点烟花爆竹，但是互联网金融却异常的火爆。早前有消息说，腾讯的“微信红包”在春节期间大行其道，微信“理财通”甚至达到了一天超亿元的进账。尽管腾讯新闻发言人对“理财通”的巨额交易予以否认，可互联网金融正在异军突起的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

时下，“余额宝”、“现金宝”、“活期宝”、“百度百发”等已经成为最吸引眼球的理财产品，较早出现的“余额宝”在今年年初募资规模已经突破2500亿元，用户数超过4900万户。

对于这股来势汹汹的互联网金融大潮，有媒体甚至联想到了当年数码相机取代胶片相机的案例，对于传统银行柜台业务存在的必要性也提出了质疑。

实际上，在这股互联网金融冲击波的背后，是消费信息化、货币虚拟化和银行网络化的大趋势。

消费信息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是中国人基于互联网的消消费习惯逐渐养成，以阿里巴巴、淘宝等为代表的网络购物在整个消费领域中所占比重快速提升。去年“双十一”购物节，支付宝交易额从从容时累计突破10亿元仅用了不到7分钟，全天天猫和淘宝总成交额超过350亿元，是美国“网购星期一”121亿交易额的近三倍。二是中国信息类消费也在大步前进。中国在去年首发的第四代移动通信运营牌照，标志着正式进入了“4G”时代。而此前，中国早已成为第一大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市场，网民数更是已经累计达到了6亿之巨，并且还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如此庞大的信息消费群体，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再次展示了科技创新摧枯拉朽的力量。

货币虚拟化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从“比特币”在去年的一次价格波动，就可以看出中国在货币虚拟化这一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上所占据的举足轻重位置。去年年初，在中国投资者的大量入场参与下，互联网虚拟货币“比特币”从不到1美元的报价一路飙涨，甚至一度摸高到1200多美元。而12月初，包括央行在内的中国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比特币交

易的限制性举措，造成比特币一度崩盘式的下挫。

据非官方的统计数据，比特币人民币交易量占其全部交易量的峰值达到78%，而在比特币大幅贬值后，这一数据则骤降至33%。虽然虚拟货币发源于美国，但是离开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全球货币虚拟化显然会缺乏强劲的动力源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巨大潜力。

还要看到的是，互联网金融巨大的冲击，其源头实际上在于这次遭遇冲击的银行行业。互联网金融的发达，与银行推进自身的网络化运营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银行的网络化为今天的互联网金融培育了大家利用互联网来从事金融业务的习惯。而包括淘宝在内的电商之所以发展壮大，与银行开放网络化结算模式密切相关。所以，如果说银行柜台业务必然要落到互联网金融的话，那也是银行业自己种下的孽因，而这显然也是行业演化更替的一条铁律。

消费信息化、货币虚拟化和银行网络化，作为科技创新引领下的大势所趋，必然会带来互联网金融的全面繁荣与传统银行业的衰落。这种由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业态更迭，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

当然，科技创新在重塑金融业态、除旧布新的同时，无法消除金融业的本质特征。跟传统银行业一样，互联网金融同样具有高风险所掩盖下的高风险的属性。有数据显示，在互联网金融高利率与高便捷等因素的催动下，我国信托产品规模目前已经超过10万亿元，而到期兑付规模也已达到1.3万亿元。与此同时，信托违约事件也开始增多，去年就发生了近14起。

因此，在欢呼互联网金融大行其道的时候，对这种新的金融模式的监管以及相应的警示性教育，同样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的投资对象大多是中小投资者，其风险爆发的危害程度也有可能空前的。如果这些还不能引起监管层和投资者的警惕，任由信托理财等金融规模无序扩大，必将进一步累积金融风险，重蹈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覆辙。

智慧城市建设的误区和难点

□ 李新社

今天，信息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信息技术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强动力。现在，我国超过300个城市相继提出要进行智慧城市建设，这体现了我国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魄力，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

应该看到，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建设过程中各种问题不断困扰着建设工作，而认识上的误区则会致使建设过程走弯路。

误区一：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是信息产业部门的事，属于信息技术范畴的事，技术越先进越好。的确，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今天刚做完的技术规划，明天就可能由于出现了新的技术而显得“落后”。因此，不断追求新技术的建设规划会使智慧城市建设成为以技术为风向标的建设，让技术牵着智慧城市建设的鼻子，最终可能会导致建设结果与实际需求相距甚远；或者建设了先进的系统但与城市发展阶段不相吻合，造成建设浪费，背离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本意。

误区二：建设好了物联网，智慧城市建设就完成了。不可否认，物联网的出现给城市建设确实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带来了发展契机。不错，物联网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而且物联网的数据把真实世界虚拟成了数字世界，使人们可以“坐在屋中观天下”。

但是，光有数据的存储、整理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全部，物联网的建立也只是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何况智慧建设的内涵是如此深厚。

误区三：智慧城市建设短期内就可完成。在短期内，花钱可以改变城市面貌，可以建设高水平的信息化系统、高质量的社会保障设施。但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是使城市居民享受更好的社会体验和服务，让城市居民能够使用、会使用、愿意使用城市的信息化设施，真正给市民带来实惠。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因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要求不会停止，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是社会发展的永恒目标。

误区四：参考技术厂商的城市建设方案就可以基本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可以说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信息技术厂商的帮助。但是，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做好全面、长远的规划，需要从城市全面发展的角度进行顶层规划，一套技术方案所能涵盖城市的宽度、广度、深度恐怕是有限的。从这一点上出发，政府部门需要既看眼前的建设需要，更要看到长远建设要求；既要尊重技术厂商的建议，也要清楚城市百姓对智慧城市的期望，避免走偏，落入技术导向误区。

误区五：智慧城市建设就是传统城市建设

的智慧化。其实，仅从建设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似乎是正确的。不可否认智慧城市建设首先面临的是城市的基础建设，但传统的城市建设基本上是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这只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方面，更多地还需对城市进行智能化建设和智慧化改造，从城市智慧管理角度进行信息收集、存储、管理、应用等方面考虑，那种大兴土木式的建设方式恐怕不是智慧城市建设正确方法。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注意防止新的数据孤岛出现、数据重复存储以及各信息化平台数据结构的不一。智慧城市建设尤其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需要从传统建设思想中跳出来，以科学发展统领建设全过程，以建设绿色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宜居城市为目标的发思想为原则。在建设过程中有几个难点主要注意。

第一，在当前社会环境正在变化的时代，摒弃城市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不正确的政绩观是难点。智慧城市建设不是作秀的舞台，除了政府部门自身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外，还需要彻底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干部考核方面存在的瑕疵。在新形势下怎样进行干部考核选拔成为新课题。

第二，数据的整合和协同。智慧城市建设